

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金卫星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 1929—1933年大萧条,摧毁了一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格局。国际联盟为缓解危机而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则成为新旧世界经济体系的转折点。英国企图借助美国的金融实力,恢复由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传统秩序;美国则希望终结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传统秩序,倡建全球经济新秩序。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最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会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法与美国在如何协作对付危机的问题上思路迥异,而会议的失败则为美国以后构建由其主导下的世界贸易金融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1929—1933年大萧条;伦敦世界经济会议;英美金融合作;世界经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F113;K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4—0069—08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一战后重建的世界金融体系紊乱、国际贸易市场处于封闭割裂状态。为稳定世界金融、消除国际贸易障碍,国际联盟于1933年6月发起召开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企图通过与美国合作恢复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但这次会议因为各种因素未能成功,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从此恶化。我国学者对30年代大萧条及其后国际形势的演变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对当时世界经济的具体变化探讨甚少,尤其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性质与作用重视不够,本文拟对此作详细探讨。

一、一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在国际投资、生产布局、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诸方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国际投资方面,欧洲战后丧失了资本输出的主体地位,美国成为世界主要贷款国家。当时德国从主要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英、法则因在敌国和俄国的资产被没收而遭受重大损失;只有美国不仅在大战期间赎回了英法所持有的美国债券,而且还通过战争贷款成为债权国。战后初期美国拥有130多亿美元的债权,其中欧洲各国政府欠美国战债即达103亿多美元,另有30亿美元属于私人债务。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成了世界主要贷款国,其对外投资总额从1919年的70亿美元增长到1930年的170亿美元,其中约40%的证券投资是在欧洲。^[1] (P181)

在生产布局方面,欧洲传统的工业中心地位衰落,美国成为全球生产、原料体系的支配中心。战前“欧洲人口不断增多,人员和资本自由移往海外的数目日益增加;机器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西欧,但1870年以后,也在美国和日本……”。^[2] (P56) 战后欧洲工业陷于萧条;英、法、德人均国民收入直至20年代中期还低于1913年,整个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八年。而美国战前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即已超过欧洲,^①20世纪20年代更是进入了“黄金时代”:石油生产占世界70%,煤炭生产占40%,工业品生产占世界46%(1925—1929年)。1922—1928年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收稿日期: 2003—06—20

作者简介: 金卫星(1958—),男,回族,江苏镇江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

^①1870—1913年,美国工业的年增长率为4.3%,远超过英国(2.2%)、德国(从1871年起为2.9%)和法国(1.6%)。参见参考文献[2]第58页。

7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人均收入增长30%。到192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世界制造业生产的地理分布由此发生了变化：

1913—1938年间世界制造业生产的分布(%)^[3] (P13)

时期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瑞典	日本	印度	其他	世界
1913年	35.8	14.3	14.1	7.0	4.4	1.0	1.2	1.1	21.1	100
1926—1929年	42.2	11.6	9.4	6.6	4.3	1.0	2.5	1.2	21.2	100
1936—1938年	32.2	10.7	9.2	4.5	18.5	1.3	3.5	1.4	18.7	100

欧洲工业中心地位的急剧衰落，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初级产品生产国工业化的兴起，扩大了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来源，改变了欧洲对外贸易的传统格局。

在国际贸易方面，英国丧失了战前的世界贸易“乐队指挥”位置。^[4] (P307) 大战前，由于工业品价格高于初级产品，英国对初级产品生产国保持贸易顺差，后者通过对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的贸易出超，弥补对英国的逆差；欧洲其它国家则通过对英国的贸易出超，支付其对初级产品生产国和美国的贸易入超。战后英国在世界工业品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从1913年的30.6%降至1929年的23.8%；而1928年英国在世界初级产品进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却与1913年相同，都是19%。^[1] (P211) 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消耗了英国的无形收入，缩小了经常性项目顺差。美国的崛起更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其一，美国增加了工业品出口和原料进口，改变了战前美欧贸易中欧洲出口工业品、进口原料和农产品的格局；其二，欧洲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口从1913年的约50%下降到1929年的30.6%；其三，美国经济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程度低于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贸易价值不到其国民收入的8%，而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则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

在国际金融方面，战后重建的以英镑和美元为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有严重缺陷。战前英国利用外贸顺差进行投资，并且凭借汇兑信誉使外国金融机构和商人相信英镑自由兑换为黄金的能力。英镑汇票不仅被用于为英国进出口融资，而且被用于为世界大部分地区融资：“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有世界范围的联系，并且通过新的股票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和通过票据市场提供短期资本。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的作用，伦敦各种金融服务工作的廉价和安全，鼓励了正常的和扩展中的国际交易。”^[2] (P58、60) 战后欧洲各国先是通货膨胀，随后又连续两年陷入通货紧缩和商业衰退。1922年国际联盟在热那亚召开金融会议，提议各国实行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英国遂于1925年放弃战时英镑/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了英镑的金本位制。^① 但重建的国际金融机制具有严重缺陷：其一，它受制于以德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的赔款与战债支付链。凡尔赛体系规定的德国赔款原则因其恶性通货膨胀而中断，而协约国偿还战债的前提是德国必须支付赔款。道威斯计划以美国的贷款启动德国经济，使其能够重新支付赔款，协约国亦由此得以向美国偿还战债，美国资本再以投资和采购的方式继续注入欧洲，由此形成了欧洲金融体系对美国资本的特殊依赖。其二，它受制于战后国际清算体制的分散化。战后纽约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改变了国际交易以伦敦为中心、以一种相对简单方式进行支付并在伦敦转移银行结余的格局。战后的各金融中心必须抵消它们之间的债权，保持相互间的平衡；多个金融中心并存使外国资金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利息率和各种其他问题，经常从一个金融中心流向另一个金融中心，形成高风险的短期流动资金；^②而“纽约不仅缺乏伦敦那种向投资者分配国际证券的经验，而且其货币市场也不能及时对有助于使国际投资更有吸引力的国际收支变化做出反应。”^[1] (P183) 其三，它受制于战后黄金存量分布的不平衡。1923年美国的黄金占世界黄金存量的44%，英国只占9%，德国、意大利等国战后则蒙受了严重的黄金流失。为弥补世界黄金储备不足和分布的不平衡，热那亚会议推荐以金汇兑本位制作为缓和世界黄金短缺的办法：允许一国根据可自由兑换成黄金的外币稳定其通货，并以该外币作为储备。会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行了金汇兑本位制。由于金汇兑本位国保留以英镑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权力，这就要求伦敦和纽约都拥有较之维持本国交易所必需的更大的黄金存量。当时纽约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而伦敦却因为对外贷款超过国际收支所允许的程度，流失了大量黄金。更有一些汇兑本位国认为持有外币而不是黄金有损本国的威望，使原来旨在缓和世界黄金短缺的金汇兑本位制“底气”不足。^③

总之，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只是初步恢复了国际经济活动，部分适应了20世纪20年代初现端倪的全球化格

① 德国在道威斯计划援助下于1924年首先恢复金本位制，到1926年共有39个国家相继恢复金本位。

② 这种“热币”在1914年前风险并不大，因为伦敦当时是短期流动资金惟一有利可图的持有地。

③ 典型的是1928年底的法国，由于当年国内金融稳定及法郎贬值产生的贸易出超导致资本还流，法国政府决定以黄金结算其巨额贸易顺差。

局，它在国际投资、生产布局、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诸方面都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一遇波动极易发生连锁性危机。

二、30年代的危机与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既是第一场全球性经济灾难，也是一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性缺陷的连锁反应。欧美各国起初“各自求生”，“以邻为壑”；继而被迫在国际金融和贸易方面合作，构建适应全球化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1929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崩溃后，世界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持续萧条，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整体下跌，国际贸易不断紧缩，货币金融危机连续扩散。世界工业生产以1929年为100，到1932年美国的生产下降为54，德国下降为53，法国下降为69，英国下降为84；1933年1月，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中以黄金计算的橡胶价格仅为1929年1月的13%，羊毛为22%，丝为28%，铜为29%，棉花为34%，大米和咖啡为41%，小麦为42%，食糖为50%；1929至1932年第3季度，国际贸易价值减少65%以上，欧洲以外的国际贸易更下降到不足30%；1932年4月，从欧洲开始蔓延扩散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战后重建的金本位崩溃和国际货币体制被摧毁。^[5] (P33)

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性缺陷，对危机的持续和深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首先，农业、初级产品在各国的保护政策下生产过剩、价格下跌，既造成世界贸易不平衡，也导致农业、初级产品经济结构性紧缩。以1923—1925年农产品价格和贮存量为100，至1929年7—10月，世界农产品价格大致跌至70，而贮存量则增加到75%。^①世界贸易在大萧条前即已不平衡：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国由于实际收入减少无力购买制成品，工业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又无力将其需求变成有效需求，许多制成品不是为供应初级产品国家、而是为工业国家的市场而生产，由此导致工业国家制成品过剩。出口下降迫使农业和初级产品国家减少进口、扩大贷款并实行货币贬值；工业国家也因出口减少而相应地紧缩银根、停止对外贷款和实行外汇贬值，由此造成的全球结构性通货紧缩，正是诱发并加重大萧条的主要因素。

其次，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资本输出中心，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严重不稳。与战前维系世界多边贸易结算体系的英国投资不同，美国投资的模式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表现为：其一，美国投资大多流向其出口产品与美国相竞争而不是互补的欧洲国家；其二，美国本身发达的工业，削弱了欧洲战前作为美国工业品供应国的地位。20年代欧洲产品平均只占美国进口的30%，远低于1913年以前的50%以上；其三，美国的食物和原材料主要来自对欧洲有贸易逆差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这使美国对欧洲不断增加的出超与其从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进口相联系，导致20年代世界贸易结算、尤其是美国对欧洲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取决于：(1)美国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投资，(2)美国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产品稳定增长的需求率，(3)欧洲对初级产品生产国在经常项目上保持以黄金和美元结算的贸易顺差。而欧洲以美国贷款为中心的赔款与战债支付体系，加重了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一旦美国的投资和进口减少，便会引发世界范围连锁性支付危机。由于美国经济本身不依赖贸易，这种减少随时可能发生。

再次，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机制，加剧了全球既有的结构性通货紧缩，造成金融危机连续扩散。由于英国缺乏充足的黄金储备，只凭汇兑信誉和对外贸易顺差保持支付平衡，经不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1928年，美国的高利率和证券投机使大量外国资本流向美国证券市场，国际贷款受到影响；法国以黄金结算外贸顺差引起的资本还流则加剧了国际贷款的紧张形势。英国无力弥补美法退出对外贷款所形成的缺口，导致国际信贷普遍紧缩，农业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又因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资金缺乏而恶化。美国证券市场崩溃后，欧洲的贷款形势一度随外资撤出纽约市场而有所缓和，但旋即又因持续的物价下跌、通货紧缩而紧张。1931年更爆发了扩散性金融危机：5月份，奥地利的挤提存款风潮波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等国；7月初，德国的银行危机迫使美、英、法决定让其延期偿还贷款三个月；7月中下旬，英国的挤兑风潮在两个月内流失了2亿英镑以上的黄金，政府被迫于9月21日脱离金本位。国际金融恐慌旋即转向美国，到1932年6月美国也流失了近20亿美元的黄金。

为摆脱危机，各国起初“各自求生”，采取“以邻为壑”的措施与政策。在金融方面，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放弃金本位，形成了英镑集团；1931年至1932年，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奥地利、阿根廷、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拉脱维亚、丹麦、爱沙尼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罗马尼亚、日本和巴拉圭等国实行了外汇管制；法国则因其黄金储备充足而坚持金本位，并从1931年9月起连续将储备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到12月中旬共计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换走3.5亿美元以上的黄金；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等国的银行也紧随其后，到10月底美国金融也陷入恐慌，流失黄金达7.55亿美元。战后重建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于瘫痪。

在国际贸易方面，1931年11月英国颁布《紧急进口税条例》，对进口货物从价征税50%；次年2月颁布正式的《进口税条例》，对一般进口货物征税10%，对大多数工业品实际征税20%，对钢铁、奢侈品等征税更高，而对主要粮食和原料则予以免税，是为1849年废止《谷物法》以后的第一部正式保护税法；^[6] (P668) 1932年6月12日至7月

① 指各国政府为维持价格而采取买进产品进行的贮存。

27日，英国与各自自治领和印度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讨论了“……英联邦内部的特惠关税和与外国的贸易条约中所规定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关系”，声明“各国政府承担在将来英联邦内不得妨碍相互提供特惠的条约上的义务”。^[7] (P200) 会议通过的《渥太华协定》规定建立“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帝国内部各邦的货物彼此实行优惠税率，形成了区域集团贸易圈。法国因坚持金本位法郎汇价偏高，便在提高关税的同时率先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大规模进口配额制度，到1932年末共有10个国家紧随其后实行贸易的完全配额或许可证制度；德国则在保持金本位的名义下实行外汇管制，停止对外支付黄金，以规定进口的外汇支出于出口的外汇收入的办法，保持对外贸易收支平衡，同时与各相关贸易国家订立双边清算协定，在“非现金结算制度”下保持有限的对外贸易；美国国会也于1930年通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法：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据1932年进口情况估计，实际上税物品的平均税率达53.2%，^[8] (P695) 战后重建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各区域贸易集团圈和各国关税壁垒的作用下，处于割裂与封闭状态。

在实施金融、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展开了有限合作。在国际贸易方面，1930年3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讨论了英国提交的议案，要求落实其1929年的建议：各国两年内不增加关税，并在关税休战期间清除国际贸易障碍，以便在稳定各国现行关税基础上，进一步促使高关税国家减低税率。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正在讨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而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欧洲以外的国家几乎全都步了美国的后尘”，^[9] (P480) 这次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在国际金融方面，当1931年的奥地利金融危机即将波及德国之际，胡佛总统于6月20日发布了《借款延付宣言》，在声明“赔款完全是一个欧洲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并强调“延付”并非取消的前提下，建议“在一年期内延付一切各政府间债务、赔款和救济借款的本利”。^[10] (P465—466) 宣言受到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欢迎，但并未能以局部的缓解阻止整个金融体系随后发生的崩溃。真正谋求从总体上缓解经济危机的国际合作措施，当属1933年6月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酝酿与召开

1933年6月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是在192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企图通过缔结全球经济合作协议，建立有序性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尝试。

早在1927年5月，国际联盟即在日内瓦发起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经济会议。与会的五十个国家的代表，以个人身分讨论了世界经济的工农业和贸易问题。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世界经济的建议，提议“从人为的障碍与限制中解放国际间的商业活动”，在国联主持下缔结一项降低关税税率的国际公约。由于各国政府只将会议限于由经济专家研讨世界经济的层次，会议并未取得实际效果。

1930年德国总理布鲁宁向美国提出：裁军、赔款、战债、关税和货币稳定等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应该在政治的基础上作整体解决，不能仅限于经济专家对每个问题的分别研讨。1931年10月，法国总理赖伐尔与胡佛总统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1932年5月中旬，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也就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与胡佛总统交换了意见。美国赞同召开国际会议，但拒绝讨论战债问题。^[11] (P36) 与此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也向国联理事会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7月9日，国际联盟召集的洛桑赔款会议达成协议，决定由国联主持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并成立“组织委员会”和“专家筹备委员会”，会议地址确定在伦敦。在会议筹备期间，法国建议搞一个国际公共工程计划，以刺激消费提高物价；英国提议建立15至2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向各国中央银行贷款以替代各国对贸易的控制；美国则倾向于各国中止关税，对国际融资不感兴趣，表示“我们将毫不含糊地反对让美国为别人的计划提供资金的建议”；^[12] (P538) 其它小国主张成立一个国际信贷机构，为各国国际赤字提供资金、稳定货币。1933年1月19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筹备会议拟定的《世界经济会议纲要》，确定会议的宗旨：一是消除对汇兑的控制和运转障碍，恢复货币的正常流通；二是尽力促使国际贸易的重新活跃，并在贯彻上述宗旨中特别提到解决政府间债务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达到财政经济稳定和货币稳定的基本条件。^[13] (P3、P22) 这个纲领主要反映了英法的立场与观点。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筹备期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罗斯福总统就任后立即插手会议的筹备活动。4月6日，他主动邀请麦克唐纳访问华盛顿，讨论“世界经济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如何使世界裁军会议取得进展”，随后又邀请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中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0国首脑赴华盛顿会谈，就一些经济问题达成“某种根本性的谅解”。4月21日，罗斯福与先后抵达华盛顿的麦克唐纳和法国前总理赫里欧，就其关心的战债、货币稳定和关税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战债问题上，罗斯福建议取消利息，重新核定本金和确定债款，并对6月15日即将到期的分期应付债款提出了一些通融办法；在货币稳定问题上，罗斯福与麦克唐纳、赫里欧一起呼吁“最终要重新建立国际汇兑中的平衡”、“恢复金融货币的稳定”，表示“我们想做的事之一，就是要使世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14] (P259) 在关税问题上，罗斯福建议自即日起至世界经济会议结束实行关税休战。4月25日首先发布了美英首脑会谈联合公报，双方确认世界经济会议“必须把普遍提高商品价格作为首要的、根本的问题”，为此“必须

同时在经济上、金融货币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经济上努力清除各种形式的贸易障碍，诸如过高的关税，限额、汇兑的限制，等等”，并且“重建国际汇兑的平衡，一旦条件许可，就重建国际货币本位制”。^[11] (P29) 随后发布的美法会谈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也与此相同。华盛顿会谈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会议的先声，“一度看来，美国像是在一场充满胜利希望的事业中，担负着领导责任”。^[15] (P240) 美国既分享了会议筹备的主导权，又在会议原定的稳定货币、促进国际贸易议题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所关注的普遍提高商品价格的议题。

其实罗斯福当时所关注的并非立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而是先缓解国内的危机：“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虽然非常重要，但在迫切性和必要性上必须从属于健全国民经济的任务。我一定要竭尽一切努力通过国际经济调整来恢复同世界各地的贸易，但是国内的紧急状况是等不得贸易上的成就的”。^[16] (P16) 就在他与英法首脑商议稳定国际金融期间，美国政府却为提高国内商品价格、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于4月19日放弃了金本位。美国计划将美元贬值15%至20%，然后与英镑和法郎固定比价，由一笔三国平准基金管理。“由于贬值实际上是在美国已有贸易顺差，并正在进口黄金的时候，……因而它起了进一步加剧国际不平衡的作用。”^[2] (P87) 英国对美元贬值15%感到震惊，认为美国并不存在像英国那样的金融压力，表示如果美元在较低的汇率上稳定下来，英镑的汇率将作同等程度的降低；法国认为这项计划将使法郎被用来买进美元，并最终贬值导致法国国库遭受损失，因而不可能被法国国民会议接受。鉴于英法未接受美国的计划，美元实际贬值达到41%，“这样一来，稳定问题与其说是英镑的问题，不如说是美元的问题。”^[17] (P520) 英法迫切要求稳定美元汇率，美国却因美元贬值导致物价、股票和证券的上涨而拒绝稳定。妥协的结果是将战债和汇率稳定问题从世界经济会议的议题中删除，改由美、英、法三国中央银行的代表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召开的同时，进行稳定币值问题的专项会谈。在此背景下，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于1933年6月12日正式开幕。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主题一是要清除国际贸易的障碍，二是要稳定国际金融的混乱形势。在清除国际贸易障碍方面，美国认为首先应该解决关税问题，而英法则将美国会前即表示反对的战债问题作为首先要清除的障碍。会议主席麦克唐纳在开幕词中率先强调解决战债问题：“必须在清除普遍经济恢复的任何障碍之前，首先刻不容缓地解决战债问题”。^[11] (P45) 法意等欧洲债务国纷纷附和。欧洲各国鉴于美国实施关税壁垒政策，难以通过对美贸易偿付战债，而美国在战债问题上又拒不让步，情况恰如美国大通银行所述：“外部世界欠我们的债，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我们用这些绳索把他们拖向我们这边。我们的种种贸易限制是紧紧顶着他们身体的草叉，我们用这些草叉把他们同我们隔开。”^[18] 显然，清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关税壁垒。美国代表团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是南方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势力的代表，他历来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大大有助于每一个国家的复兴和繁荣，而且也是人类经验中最伟大的文明教化者与和平缔造者”。^[19] (P112) 而“保护性关税是‘万恶之首’，是经济战的温床，是‘造成当前恐慌的最主要的惟一基本原因’”。^[20] (P47) 他向会议提出了《全面降低关税公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 各国自1933年6月12日起将现行关税普遍降低10%；(2) 限制给予外国的特惠条例，缩小优待税率的差额；(3) 废除关税以外的进口限额和其他限制进口的措施；(4) 通过缔结协定，控制与管理进口限额及其他限制进口的措施；(5) 如果那些在1933年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有50%以上的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公约即视为生效；(6) 延长所有已付诸实施的关税休战；(7) 提倡和鼓励消除以后贸易上的障碍。^[21] (P30)

赫尔草案主要针对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和法国的进口限额制度，而将现行关税普遍降低10%并不影响美国的进口税率优势。英国对此建议均衡降低关税，取消对私人企业、尤其是对出口和航运的津贴，建立全球普遍性低关税体系；法国则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美国的方案，但保留增加现行关税附加税的权利，并称：“只要美元继续波动并有进一步贬值的危险，巴黎就决不会同意约束法国限制美国商品进口的权利。”^[20] (P64) 6月22日，赫尔又提议取消国际贸易中的一切差别和优惠待遇，迅速彻底地消除贸易禁令和进口限额，并就缔结降低关税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进行谈判。由于当时与会各国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货币稳定问题，而赫尔本人在此问题上被排除在罗斯福政府的决策圈之外，关税问题未能在世界经济会议中取得任何谈判成果。

在稳定国际金融形势方面，会前即商定将稳定货币作为世界经济会议的专项议题，由美、英、法三国中央银行代表在伦敦同时进行会谈。罗斯福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贬值提高物价、振兴国内经济，为此他专门派奥列弗·斯普雷格和乔治·哈里森处理稳定币值问题，将赫尔代表团的使命严格限制在谈判贸易协定方面，不得参与讨论稳定货币问题——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14] (P264) 英法在会谈一开始即强调币值稳定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提出，“(会议的) 当前目标，应该是世界主要国家之间货币的大致稳定，以便能使国际贸易不被这些基本货币的狂涨暴跌所阻碍。”^[11] (P50) 法国财长认为“所有货币的最终稳定是会议的中心目标”，^[11] (P61) 法国甚至将美元的稳定作为其降低关税和在经济领域取得任何进展的先决条件。会谈的第三天，三国中央银行的专家根据5月31日的市场汇价达成了一项稳定货币的初步协议：将美元稳定在4美元合1英镑，和0.04662美元合1法郎的水平，允许上下浮动3%；三国中央银行将通过抛售黄金支持各自的货币，黄金销售的限额为400至500万盎司，相当于8千万到1亿美元；如果这项措施还不奏效，三国将对原协定重新审核研究。

但6月15日即协议通过的当天，美元与英镑的市场汇价已经跌至4.15:1，稳定币值协议的消息透露给报界后，美元汇价立即回升至4.02，商品和股票市场的价格亦随之下跌。6月17日，罗斯福总统电告美国代表团不能接受4美元合1英镑的方案，要实现稳定货币的最终目标不能只靠三四个国家的努力，需要在世界范围采取行动。他要美国代表团避免承诺（哪怕是暂时地）控制美元上下浮动的明确计划。6月21日，罗斯福派亲信雷蒙德·莫利作为特使赴伦敦提醒美国代表团：总统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在全世界提高物价。^[20] (P72, P76) 6月22日，美国代表宣布：“华盛顿当局认为，暂时稳定货币的措施在目前是不适宜的。”^[22] (P278)

罗斯福对稳定美元方案的否决，使美元重新下跌、物价和股票价格上涨。法国对英国表示：“如果美元对英镑的汇率不被稳定，那么英镑对黄金通货的比价也就不能稳定，美元不能被稳定，看来已经构成对那些仍然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的双倍威胁。”^[11] (P61) 当时，“金集团”的荷兰、瑞士都出现了挤兑黄金风潮，荷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在一周内从83.47万盾下降到79.18万盾。6月30日，“金集团”国家和英国为首的部分非“金集团”国家再次拟订了一份稳定币值协议草案：重建金本位制，规定采取适当措施限制金融领域的投机，由中央银行进行合作以便在一个时期内稳定货币等。^[11] (P62) 此时，美元对英镑的比价已达4.33:1，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到130，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达到100。7月1日，罗斯福在给赫尔的信中指责了“靠一纸协定来实现货币稳定的老一套做法”，表示不能“听任别的国家对我们的行动强加限制”。^[20] (P76) 7月3日，罗斯福给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发出了措辞更为激烈的电报：“如果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竟为仅仅涉及几个国家货币兑换的纯属人为而权宜试验性建议所转移，……简直相当于一场世界性悲剧的灾难。”“我们的广泛目标是使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维持长期稳定。……如果有朝一日世界大多数国家能够制订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平衡预算、量入为出，我们才可以恰当地讨论如何更合理地分配世界的金银资源作为各国货币的储备基础。恢复世界贸易不仅作为一种手段，而且作为目的都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对此，暂时的固定汇率也不是正确的答案。我们必须做的倒是缓和现存的禁运以方便产品交换、互通有无。”^[23] (P673)

罗斯福的这封电报被形容为“炸弹信息”，它使此前三国银行家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伦敦世界经济会议陷于窘境。7月4日赫尔向罗斯福反馈说，麦克唐纳表示，“欧洲不想干涉美国国内的政策，或使你的工作比目前更困难。但直至获悉你昨天的电报为止，他都希望能与你合作寻求一项安排，这项安排将不以欧洲的混乱为美国成功的代价。……他难以掩饰被你昨天电报伤害的痛苦。”^[24] (P66) 在7月4日的会议上，麦克唐纳提议休会。英国与法国、荷兰的代表还共同起草了一份说明决定休会原因的文告，阐述了罗斯福开始在5月16日对各国首脑发布赞同与其他国家一起稳定金融的电文，结果在7月3日转而发布变卦电报的事实。英国首相公开表示，由于“一个国家的”某种货币政策，世界经济会议已经不可能继续进行。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最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在罗斯福的示意下，赫尔努力使会议一直拖延到7月27日才宣布无限期休会。会后，英帝国的成员国正式组成英镑区，法国为首的金集团则形成了更加充分的保护圈，它们与美元集团的货币战不仅加剧了世界金融形势的混乱，而且进一步恶化了国际贸易和关税的局势，使欧洲国际关系更加紧张。

四、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几点分析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第一次企图通过国际协作，建立全球性贸易金融合作机制对付危机的尝试。会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法与美国在如何协作对付危机的问题上思路不同；而会议的失败则为美国以后构建由其主导下的世界贸易金融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从形式上看，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与1927年的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一样，都是由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召开的全球性经济会议。其目的都是要在英法（主要是英国）的主持下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运行。但实质上，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是在英国已经无力继续承担履行世界银行家职责义务的背景下召开的，是英国企图让美国分担缓解金融危机的义务、以便继续保持其对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政治会议。英国战前对世界经济的“乐队指挥”作用，主要依赖广泛的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大萧条期间英国已经在贸易和金融方面陷入困境。恰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所指出，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的衰退将经由这个萧条的国家扩大借款而得到平衡。这种贷款为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融通资金，使投资能够维持下来。在1914年以前的岁月里，英国操作着这种机制；1929年后就没有能力起这种作用了。^[15] (P144) 1932年7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委员会成员休伯特·亨德森爵士也在给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指出，英国过去总是通过向陷入金融危机的中心地区运送黄金、从未受危机波及的中心地区提取黄金的办法，帮助处于困境的其他国家维持其清偿债务的能力。“伦敦现在已经无法履行这一关键性职责，也没有别的中心愿意并且有能力来履行这种职责，这就是当今世界发生困难的实质所在。”^[15] (P247) 事实上，当时美国是有这种能力的。但美国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从其在世界经济所处的地位来看，都不可能为英国承担这份义

务。因此，英国只能借助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试图通过缔结国际协定的政治手段，让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参加承担保持世界金融货币平衡义务的行动，而在全球金融合作机制中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主导地位。

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伦敦经济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它首先是因为，美国与英法在消除国际贸易的障碍、保持国际金融货币稳定方面的分歧，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处理经济危机的思路与方法的矛盾。美国强调的是各个危机国家和地区先行“自救”，通过健全国内内部的经济体制达到保持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早在5月20日，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助理国务卿莫利即声称，世界经济会议除了就各国国内经验交换意见外，不会有多少结果。“可能会有许多人认为，由于萧条是世界性的，所以它完全是国际条件造成的；或者说，要解决这种世界范围的萧条，只能依靠国际性的办法。……其实，每个国家经济上出现的不幸，相当大的部分是国内问题。……救治的办法主要应当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所作所为。”^[15] (P249) 而英法则仍然主张通过传统的对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的地区协作与调整，达到保持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平衡。其次是因为，美国与英法在会议中所要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强调的是通过国际会议提高商品价格、振兴国内经济，为美国的商品拓展国际市场；英法侧重关心的是借助美元的雄厚实力保持国际金融货币的稳定，消除国际贸易结算上的障碍，恢复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再次是因为英法和美国对危机的承受力不同，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依赖程度也就各不相同。英法经济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历来依赖对外贸易，法国则在金融方面长期坚持通货紧缩，两者在危机中都直接承受着国际贸易动荡和货币金融狂涨暴跌的打击，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困境，亟需仰仗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而美国幅员辽阔、经济结构完整齐全，黄金储备充足，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比重不大，在危机中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自然是基于孤立主义的传统，采取漠视别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1933年4月放弃金本位都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维护本国农业的利益，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举措。导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的“炸弹”电报，只不过是美国此前单边主义政策的延续。

从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回顾，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也是美国剥夺英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为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金融新秩序奠定基础的历史转折点。英国在会议上虽然也主张恢复自由贸易，但那是以（与美元合作的）英镑作为多边贸易结算中心、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依托、英国继续充当世界经济调控者的“传统”自由贸易，美国在其中只是一个帮助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配角；美国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全球市场门户开放，“使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维持长期稳定”。因而“恢复世界贸易不仅作为一种手段，而且作为目的都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当时唯一看出这个历史转折趋势的人，是称罗斯福的“炸弹”电报“极为正确”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会前也认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设计出某种联合行动，以减轻中央银行的焦虑，缓解其储备的紧张，或者消除对这种紧张的恐惧和预期。这将使许多国家能够达到……银行信贷便宜和充足的阶段。然而，通过国际行动，我们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却不能强迫它喝水，那是这些国家自己的国内事务。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为它们提供水源。这次世界大会的首要任务是释放出千万条购买力的溪流以滋润干涸的世界，使之恢复生机和活力。”^[25] (P388)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后，美国即采取措施剥夺英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为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金融新秩序奠定基础。首先是继续降低美元汇率提高黄金的收购价格。1933年11月15日，美元与英镑的比价降至5.5:1；次年1月30日，美国通过了黄金储备法，2月1日，罗斯福总统将黄金固定为每盎司35美元，亦即美元的含金量贬值为原来平价的59.06%。“这些高度技术性交易的实际结果是，英国财政部在1932年一直利用来损害美元的货币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根据美国财政部长1934年2月宣布的规定，英国和其它国家除非准备按照美国规定的价格出售黄金，否则不能从美国购买黄金。简言之，它们除非遵守美国的规定，否则不能在美元市场进行业务活动。”^[26] (P286)

其次是通过双边贸易协定开辟国际贸易市场。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政府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授权总统对外谈判缔结互惠贸易协定，可根据协定修改关税率，上下幅度可达50%。^[27]该法律最初有效期为3年，以后延长了11次，直至1962年才失效。《互惠贸易协定法》一是改变了美国奉行的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并重的矛盾政策，标志着美国开始从达到顶点的贸易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化；二是为美国开拓了国际市场、扩大了贸易出口，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复苏：1934年到1939年，美国先后与28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① 出口贸易增加了48.9%，进口增加了40.1%；三是为美国对外扩张、影响和支配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外交工具：法案使关税减让成为行政机构外交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了美国利用经济手段对外扩张、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能力。它与当年2月建立的进出口银行一起，成了美国影响和支配国际关系的外交工具；美国政府可以为了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而决定是否对某个国家实行关税减让、以及提供或撤销贷款。更重要的是，《互惠贸易协定法》是罗斯福政府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起点。该法案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既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构建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也是战后

① 其中英国和加拿大是1938年11月17日才与美国签订协定的最后两个国家，美国也因此从局部打破了渥太华协定的帝国特惠关税制。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核心原则。

第三是初步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1936年9月，在迫使英法接受美国规定的黄金出售价格、以法国为首的黄金集团被迫解体的背景下，美国与英法达成了“三国货币协定”。三国同意尽力维持协定成立时的汇价，减少汇率的波动，共同合作保持货币关系的稳定；当年10月，三国又签订了相互间自由兑换黄金的协定。该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三国间的外汇倾销，实现了三国间货币关系的相对稳定。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很快败降、英国起初在“现购自运”的原则下向美国购买军用物资，引起黄金外流而导致“三国货币协定”的垮台，但这个合作过程却为美国战后建立稳定世界金融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经验。

总之，尽管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初衷是英法企图借助美国的经济实力，缓解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所面临的国际金融体系紊乱、世界贸易市场封闭割裂的困境，摆脱世界经济的失控状态，重新恢复以欧洲为主的世界经济协调机制，其最终结果却促成了美国打破欧洲主导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传统格局，迈出了构建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A·G·肯伍德、A·L·洛赫德·国际经济的成长：1820—1990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 [2] C·L·莫瓦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1898—1945）[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3] League of Nations·*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Z]·Geneva：League of Nations Printing Office，1945.
- [4] John M·Keynes·*A Treatise on Money*；vol· 2· [M]·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30.
- [5] League of Nations·*The Process and Various Pha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Z]·Geneva：League of Nations Printing Office，1931.
- [6]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 [M]·上海：三联书店，1991.
- [7] 宫崎犀一、奥村茂次、森田桐郎·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8] 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9]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10] 胡佛延债宣言（1931年6月20日）·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年）[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 [11] Arnold Toynbee·*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3 [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
- [12]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3，Vol· 1· [Z]·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
- [13] The Program for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The Experts' Agenda and Other Documents；The Foundation of World Peace [Z]·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 [14] Ferrell·*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M]·H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 [15] C·P·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M]·Santa Cruz：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 [16] 关在汉·罗斯福选集 [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7]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 [18] *The Economic Bulletin of the Chase Manhattan*，Mar· 14，1930.
- [19] Julius W·Pratt·*Cordell Hull*；vol· 1· [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4.
- [20]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1]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5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 [22] G·M·Gathorne-Hardy·*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0—1939 [M]·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34.
- [23] Michael A·Butler·*Cautious Visionary：Cordell Hull and Trade Reform*，1933—1937 [M]·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 [24] 凯恩斯·“给世界经济大会的建议”[A]·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 [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25] W·N·Medlicott·*Contemporary England* 1914—1964，with epilogue 1964—1974 [M]·London：Longman Group Press，1976.
- [26] W·S·Culberson·*Reciprocity Trade Agreement Act*，1937，Appendix 3·Whittlesey House，1937.

责任编辑：宋 鸥

increasingly identified by European patients and doctors.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1933 and London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JIN Wei-xing(69)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1933 destroyed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reconstructed after World War I. London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conven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for reviving the world economy, became the turning point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e U.K. attempted to come back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world economy led by itself through having the aid of American finance strength. However, the U.S. expected to finish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world economy led by the U.K. and set up a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No agreement on substantial issues have been reached eventually. The reason why the conference had failed is that the U.K. and the U.S. had different thoughts in cooperating with each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However, the failure of this conference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U.S. to construct the world trade and finance cooperation mechanism which was dominated by itself.

JIANG Jieshi and the Emperor System of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CHEN Fen-lin(77)

The preservation of emperor system of Japan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t that moment.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JIANG Jieshi to agree to preserve the emperor system during the Cairo Conference, which had influenced the U.S. president Roosevelt's decision on this problem. It was just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t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the issue of emperor system, the polity of Japan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Cairo Declaration, which provided a bas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emperor system afterwards.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America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 complete and integrated Japan in its Asian strategy, and America played a decisive role on this matter.

On the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CHEN Zhi-qiang (84)

The world system before 1500 were not formed.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omes from the changing world after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new the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The system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 formed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two systems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times, with the notable remark of frequent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 system and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the results of industri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S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history studies have the same observation and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both of them grow up.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ay their attention to the control power or balance power among the nations, while the historians of the world history focus on the procedure of the world system formed. It i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entity and essential problem of the world history deal with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also the basic and elementary core or kern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

The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ing Tools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Applications of Academic Databas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LUO Xuan(92)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of Internet, there appear various kinds of academic databases. Accordingly, the formats,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existing environment of the carriers for academic files have changed fundamentally. As a novel kind of historical researching tool, database is bring radic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ways historians conduct their research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earch work, changing the nature of every step for material collection, tracing the latest academic trend, and enriching researching sources, etc.. Therefore, databases will trigger a renovation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ies.